

现代学人的信仰

刘梦溪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现代学人的信仰

刘梦溪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学人的信仰/刘梦溪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
2015

ISBN 978-7-100-11398-4

I. ①现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5113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现代学人的信仰

刘梦溪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11398-4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9 1/2 插页 2

定价:45.00 元

目 录

题记 / 1

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 / 7

王国维陈寅恪“气类忘年” / 23

陈寅恪的“哀伤”与“记忆” / 37

陈寅恪是一位贵族史家 / 50

吴宓和“雨僧日记” / 56

晚年的陈寅恪与吴宓 / 62

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 / 68

钱锺书的学问方式 / 79

章太炎和晚清诸子学 / 100

章太炎与国学 / 111

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 / 120

熊十力与《新唯识论》 / 155

冯友兰和“贞元六书” / 173

金岳霖的逻辑	/ 184
傅斯年的胆识	/ 191
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	/ 198
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	/ 206
悲剧天才张荫麟	/ 221
学问天才陈梦家	/ 226
张申府一篇文章的代价	/ 230
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张舜徽	/ 236
茅盾与红学	/ 247
“花落花开，水流不断”——缅怀赵朴初先生	/ 262
“高文博学，海外宗师”——怀念柳存仁先生	/ 268
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	/ 286
附录一 儒家话语下的宗教与信仰	/ 292
附录二 一架子书和一所荒凉的花园	/ 300

题记

中国现代学术就历史时间段而言，主要指晚清民国以还，包括辛亥革命前后、五四前后，以及后五四时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，直至后来与当代学术段域相重合部分，前后经过了百年的时间。中国现代学术的总成绩，我认为那是清中叶的乾嘉之后，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。

不同于往昔的特殊之点在于，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问结构，在西学的训练方面，无论汉、宋儒还是清儒，都不能与之同年而语。而他们的国学根底，又为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。此无他，盖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身世经历使然。他们处身于社会转型、新旧交替的开放之世，往往十几岁或二十几岁，便负笈游学欧美和日本，掌握一到数种异域文字，屡见不鲜。他们中的佼佼者又大都出生于旧学根底深厚的

家庭，所受教育得天独厚，诗词古文和四书五经不必说，有的十几岁就读完了十三经、前四史和诸子集成，特异者至有能够背诵其中的大部分内容。

所以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，正值古与今、新与旧、中与西的文化交织震荡之时，他们自身却从不发生文化失重现象。陈寅恪十三岁开始游学日本，后断续在欧美的大学和研究院，前后停留异域有十七年的时间，主要以研习治学工具为课业，掌握十余种外域文字，所受西学浸润自不待言。但寅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露出西学的痕迹。相反一再申说嘱咐：“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”陈寅恪如是，本书所涉及的严复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吴宓、马一浮、章太炎、熊十力、冯友兰、蔡元培、傅斯年等现代学人，莫不如是。钱锺书掌握的外域文字看来没有陈寅恪多，但对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班牙诸国文字运用的精熟，容或在陈寅恪之上。但钱先生的名言是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”胡适之先生早年尝有“西化”之说，但英文笔下关涉到中国文化，正面叙论之外鲜有异词。王国维则视古今中西之“学”为一体，认为强为之分中西、分古今、分手段和目的、分有用与无用，均所谓不知“学”者也。

王国维扮演了现代学术开山的角色，早年究心西学，对西哲康德、叔本华读其书而大好之。嗣后一变而为中国诗学和

宋元戏曲，再变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。学术创获在现代学人中首屈一指。但一生矛盾，遽发一时，最后以自己的方式遁走人寰，时在1927年6月2日。两年后，与王气类相投的陈寅恪，受命撰写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，其中的经典名句是：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”又说：“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独标为学必须具备的“独立自由之意志”、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并视若生命，终生以之，绝不动摇。中国现代学人的志节、精神、信仰，王、陈堪称典范。

五十年代初陈寅恪还曾说过：“无自由之思想，则无优美之文学。”揆诸百年以还的中国现代学人，无一不可为证。梁任公的笔墨含情、汪洋恣肆的大块文章，盖其思想自由使之耳。章太炎的挥斥古今，空诸依傍，牢狱不能折其志，羈縻无法诱以降，亦独立自由之意志挺之也。相反，为学而不能守持独立自由之意志，则学术创获必受影响。

高士逸人马一浮，居僧舍，栖陋巷，学富五车，粹然儒宗。不意日寇犯华，战乱流离之际，应民国政府之最高层邀为创办复性书院，虽有一定经费拨给，仍恪守学术独立，坚持书院置身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。而前此讲“六艺之学”于播迁

至江西泰和、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，开讲即向诸生示教言曰：

“此是某之一种信念，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，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，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，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，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，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。”其怀抱信仰由国族而及于全人类，当艰苦蹇难之际，发此沉着刚毅之音，信念何其坚牢乃尔。他的精神旨归是：“天下虽干戈，吾心仍礼乐。”

而在1938年6月，马一浮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序中，又引《大戴礼·哀公问五义篇》对“士”的解释。哀公问孔子：“何如则可谓士矣？”孔子回答：“所谓士者，虽不能尽道术，必有所由焉；虽不能尽善尽美，必有所处焉。是故知不务多，而务审其所知，行不务多，而务审其所由，言不务多，而务审其所谓。知既知之，行既由之，言既顺之，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。若此，则可谓士矣。”马先生可谓用心良苦。他说古代的“士”，即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。“知识”的“知”，须是知其然，又知其所以然，而且知而能行。行亦不在多寡，重要的是“审其所由”，知道为什么这样做。既然做了，就无可对人言。问题是要“审其所谓”，明白其中的道理为何。此即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认知的意识。所以《大戴礼》释“士”，才有“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”的关键词。不可“易”者何？“士”之“志”也。无论贫穷抑或富贵，都不能降其志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，亦为斯义。马先生解“志”为

“敬”，即个体生命的自性庄严。这和陈寅恪力倡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完全若合符契。我近年研究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可能有的意义，尝提出“敬”这个价值理念，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。

中国现代学人中的第一流人物，正是由于做到了志不可夺，独立自由之意志不可动摇，学问与人格才见出精彩。王国维如是，陈寅恪如是，马一浮如是，钱锺书亦复如是。只不过呈现的方式，因各人的经历、环境、性格的不同，而有所区分。对学问本身的坚守，即为独立自由之意志未见夺的表现。主张历史写作可以带有审美追求的张荫麟，只活了三十七岁，但以高才与执着、勤奋与敏锐，赢得同侪俊杰的一致赞许。他的学问如同他的性格，最当得“不苟”二字。不到二十岁时他就提出，学者应有“作家的尊严”。所谓“作家的尊严”，就是为学为文要独到，有个性，有自己的风格。其所著述与所言互为表里，皆能“审其所谓”和“审其所由”。一部仅写到东汉的《中国史纲》，引无数学人竞折腰。他的早逝，实与情感的挫折有关。但在他的好友、哲学家贺麟看来：“求爱与求真，殉情与殉道，有同等的价值。”陈寅恪、吴宓、钱锺书、熊十力、钱穆等学术重镇都曾为他的早逝著文哀悼。陈的挽诗有“与叙交情忘岁年”句。钱锺书的哀诗则云：“气类惜惺惺，量才抑末矣。”不约而同地表达惺惺相惜之意。本书所收《悲剧天才张荫麟》一文，所叙论掘发即为此一义谛。

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人发生兴趣，源于上世纪八十年

代的一次学术转变。我由阅读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锺书而窥得现代学术的无量藏。大家知道本人在二十年前，曾主持编纂过一套大书，名为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，两千余万字，积七年之功始竟其役。此举的是非功过姑置勿论，对我个人为学而言，是使我有机会熟悉现代学术的知识谱系，包括典范人物和历史流变，如历史的记录影像一样刻印在我的脑际，挥之不去不说，想忘却他们已不能做到。后来我的集中研究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马一浮等几宗学术个案，即与此直接有关。他们之外的现代学术人物，亦难免时而专论，时而合论，不断地反复出现于自己的笔端。本书所收的各篇文字，就是二十年来陆续所写。只有《钱锺书的学问方式》和《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》两篇，是为最近写就。其实我研钱所下的功夫，一点不少于陈寅恪和马一浮，此两文的成稿，我感到了些许安慰。

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知识群体，他们的独标与秀出、性情与著述、谈吐与风致、精神与信仰，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磨的典范意义。他们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，恰好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所缺乏。缅怀赵朴初和柳存仁两先生的文字一并收录，是觉得他们身上不无我心仪的现代学人的流风遗绪，亲聆警效，感会尤深。附录的文字则关乎读书、为学和儒家的信仰传统，仅供本书读者聊作参证而已。

（2015年4月3日记于北京之东塾）

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

我所说的最后归宿，是指1927年的6月2日，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面投水自杀，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，正值他的学术盛年。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，现代学术的开山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，逊帝溥仪的老师，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，突然自溺而亡。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，也可以说震动了世界。近百年以来，对于王国维的死因，远不能说已经研究清楚，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探讨的学术之谜。

我这里并非专门研究王国维的死因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试图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。只是想说明，王国维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，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。下面，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十个问题层面，逐一加以探讨，敬请关心静安其人其事其学的朋友不吝指正。



王国维

一 个人和家庭的矛盾

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，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，曾经封过郡王。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，便成为海宁人。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，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。到他父亲的时候，家境已经很不好了。他的父亲叫王乃誉，有点文化修养，做生意之余，喜欢篆刻书画。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做过幕僚。喜欢游历，走过很多地方，收藏许多金石书

画。王国维出生那一年，王乃誉已经三十岁了。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。这块土地人才辈出，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，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。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，写诗说：“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。”

但王国维四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，由祖姑母抚养他。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，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。有记载说，王国维从小就性格忧郁，经常郁郁寡欢。不久父亲续娶，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，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。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有时跟一些少年朋友聚会，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，不敢在外面耽搁，怕继母不高兴。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、一个少年儿童，影响是很大的，可以影响到他的一生。所以我说这是一重矛盾，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。

二 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

晚清的风气，特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，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，所有富家子弟，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。王国维家境贫寒，没有这个条件。他因此自己非常焦急，父亲也替他着急，但没有办法，只好“居恒怏怏”。十七岁的时候，他也曾应过乡试，但不终场而归。二十二岁结婚，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，莫家是商人家庭。他的婚姻，依我看未必幸福。想提升学问，没有机会。想出国留

学，却得不到经济支持。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矛盾。

三 精神和肉体的矛盾

王国维小的时候，身体羸弱，精神非常忧郁，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，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关系。父亲王乃誉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，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做了很好的设计，但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。而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，从小就是一个智慧超常发达的人。一个很瘦弱的身体，你看王国维的照片，就可以看出来，智慧却超常。所以他在《静安文集》的第二篇“序言”里讲：“体素羸弱，性复忧郁，人生之问题，日往复于吾前。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，这就是他年轻时候性格的特点，这特点延续了他的一生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。

四 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

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。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，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，甚至他的最后归宿都与之有关，这就是他和罗振玉的恩怨。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，不能到国外游学；应试，屡考不中；当过塾师，但很快就辞职了。直到

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才有一个机会，到上海《时务报》做一份临时工作。《时务报》是汪康年所办，主笔是梁启超，章太炎也在《时务报》工作过。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，在全国有很大影响。不过王国维参加《时务报》工作的时候，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，应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之约，主讲时务学堂。

王国维在《时务报》只是一名书记员，做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。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《时务报》工作，因为家里有变故，回海宁处理家事，让他临时代理。一个大学者的料子做如此简单的工作，未免屈才。但他很勤奋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教授日文的东文学社，是罗振玉办的，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。在那里认识了罗振玉。认识的机缘，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，上面有《咏史诗》一首：“西域纵横尽百城，张陈远略逊甘英。千秋壮观君知否？黑海东头望大秦。”王国维的《咏史诗》共二十首，罗振玉看到的是第十二首，写汉代盛时和西域的关系，气象很大。罗振玉看后大为赞赏，非常欣赏作者的才华。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他诸多事情所累，学得并不是太好，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，使其无后顾之忧。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。从日本回来后，罗振玉凡是要举办什么事业，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。罗、王的友谊，特殊关系，就这样结成了。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，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。王国维一生始终都没有钱，罗振玉

不断给予资助。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，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，他觉得是好事，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非常高兴，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。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。但王国维不这样看，他一方面心存感激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一种压力。因为王国维是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。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，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。

五 “知力”与“情感”的矛盾

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，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，情感也非常深挚。所以他擅长写诗，能写很好的词，同时在理论上、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。一个人的知力、理性思维不发达，不可能有那么多学术成就，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，又考证殷周古史。而没有深挚的情感，他也不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。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，但从另一个侧面看，它们也是一对矛盾。他自己说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为诗人，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”那么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，还是研究哲学？还是在二者之间？他感到了矛盾。当然用我们后人的眼光看，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多，知力也多，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，大诗人。但在王国维自己，却觉得是一个矛盾，矛盾得彷徨而无法摆脱。